

贵州作家論丛

贵州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



责任编辑 彭鹤松
封面设计 黄小祥

ZY 4

贵州明清作家论丛

贵州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 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172千字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00

书号：10115·607 定价：1.40元

目 录

明代贵州诗人王训	李子和(1)
读邱禾实的山水诗文	张亚新(10)
孙应鳌诗歌创作刍议	张亚新(18)
谢三秀和他的诗	石延寿(32)
潘润民其人其诗	张亚新(45)
画家手眼，诗人肝肠	陈训明(54)
——试论杨龙友诗文的艺术特点	
杨龙友诗歌的爱国思想初探	全建华(69)
论吴中蕃的诗歌	李子和(83)
罗兆甡诗歌概说	张亚新(98)
周渔璜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黄邦君(110)
陈钟祥《香草词》论略	张亚新(129)
浅论黎兆勋的词	黄万机(142)
郑珍的诗论及诗歌创作	黄万机(157)
莫友芝和他的诗文	刘之侠 熊易农(188)
黄彭年诗歌试析	黄万机(215)
试论黎庶昌散文的艺术特色	黄万机(231)
姚茫父《曲海一勺》漫评	陈训明(245)
后 记	(254)

明代贵州诗人王训

李子和

王训，字继善，号寓庵，是明代早期贵州的一位杰出的诗人。

王训诗文原来是不少的，后来由于兵燹频仍，尽皆散佚。因此，对他的诗文全貌及其成就，已不能作出比较完备和充分的论述。现在只能从一些有关的文献和志乘中，搜寻出王训的七律十首，文两篇，颂一篇而已。本文拟就志乘中有关王训的记载和这极少的诗文，作一简略评介。

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贵州通志》、《贵阳府志》、《黔记》及《黔诗纪略》等都有关于王训的记载，可以略知其人：

一、关于王训的籍贯。王训是贵阳人，但他的祖籍是河北昌黎。清莫友芝《黔诗纪略》说王训是“贵州卫人”，未说明王训的祖籍。《贵州通志》和《贵阳府志》均作“贵州宣慰司人”。盖当时卫人附于宣慰司学。司地在清代隶贵阳府，卫地隶贵筑县，司、卫都属今天贵阳的范围。只有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以下简称《图经》）载有王训小传说：“王训，字继善，昌黎人，号寓庵”，在《图经》儒学目的记上也作“训导昌黎王训”。《图经》是我省最早的一部地方志（另一部《贵州宣慰司志》已佚），编订和刊行的时间距今有四百七十多年（在公元1506年前），故其记载是最接近王训生活年

代的了。所以，王训的祖籍应是直隶昌黎。但，是王训祖上哪一代或是王训幼年才到贵州，则不可考。由王训十八岁上保边策和他在贵州应试的情况来看，王训自幼在贵州并籍隶贵州，则是无疑的。《黔诗纪略》、《贵州通志》、《贵阳府志》、《黔记》等书作者，或许有的未见《图经》（《贵州通志》就认为莫友芝未见《图经》），有的忽略了王训祖籍事，故不及之。

二、王训的生卒年月已不可确考，生平经历则记载寡简。他十八岁曾上策给宣宗朱瞻基，中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云南乡试举人。英宗正统初，当过训导。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在王骥幕府中，十四年在侯琎幕府中，皆佐赞军事，旋升为本卫教授。晚年得封武略将军。后在贵阳城北之白崖山，隐居读书，赋诗作文。卒年八十。王训官职是很卑小的。他中年潦倒落魄，后来也没有什么官职上的升迁。晚年虽因子得封（其子的字名、行迹亦不可考），也仅是一种荣誉性的头衔。他生活年代大致是明成祖永乐中到明孝宗弘治初，即生年大约是公元1409年至1418年，卒年大约是公元1488年至1497年，主要活动时期在明宣宗、英宗和代宗三朝。

三、王训不仅有才情，而且知兵有权略。是一位关心现实政治的诗人。《贵阳府志》说他躯干雄伟，孔武有力，性慷慨，诗文雄伟有气骨。贵州明代以来，著作见于史者，别集（即诗文集）始于王训。《图经》说王训：“有《寓庵文集》三十卷并《孙子注解》传于世”，可见当时其著作的流行。《明史·艺文志》和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其《寓庵文集》三十卷之目。

四、莫友芝说王训“教法严整”，“开草昧之功不能不首推教授。”王训一生只当过训导和教授的卑微学官，能得到莫氏这样的赞誉，确实说明王训在文教方面，起过较大作用和有相当的影响。

明代初、中期，全国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但当时位于大陆腹地的贵州，尚未有如中原和东南沿海地区的繁荣的工商业，经济还较落后，仍保持着浓厚的封建保守性与局限性。文化教育方面亦复如此。但是，自“改土归流”以来，由于外界的影响逐渐增强，经济和文化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莫与俦云：“当永乐置省，才有三学。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令贵州儒生就试湖广，宣德四年又令附云南乡试，定贵州贡士额一人。至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贵州已增建二十余学，遂与云南分闱，贵州解额二十五人。其后，学增至三十余，贡士增至四十人。会试成进士者，科亦四、五人。而至宣、正以来，名臣如张孟弼、黄用章；名儒如孙淮海、李同野，敢谏如詹秀实、陈见羲；忠贞如申天锡、何云从；循吏如易天爵、陆兑峰；文学如谢君采、吴滋大，诸老先生联袂而起……较之初，省亦可谓极盛也已。”（《黔诗纪略》卷一）由此可以看到，王训以后，贵州的人才相继涌现，文化亦逐渐趋向繁荣。

《黔诗纪略》收录了明代贵州诗人二百余人的诗作。由于种种原因，所录明初、中叶的名家不很多。《黔南丛书》第三集所收的明人诗集，只谢三秀（君采）的《雪鸿堂诗搜逸》及吴中蕃（滋大）的《敝帚集》两种。加上有专集行世的孙应鳌、潘润民、杨文骢等，不过一二十家。莫友芝谓王训是贵州“开草昧之功”的第一人，但后来清陈田的《黔

《诗纪略补》还搜集了一个明洪武时代诗人唐贞、一个明永乐时代诗人刘宏的诗作。王训在贵州明代诗人中，按出现的时间看，位居第三。但我以为王训应是当时最早最有影响的大家之一，那两位洪武、永乐诗人远远比不上他。虽然他的诗文后来尽佚，已无法尽知具体情况。不过从《明史·艺文志》和《千顷堂书目》载其文集三十卷之目，可以想见当时他在贵州诗坛上的地位。即使在他归隐白崖山之后，仍与一些诗人不时过从，相互酬唱。当时的诗人对他是很推崇的。著有《蝉噪集》的贵州诗人徐节曾赠诗王训云：

先生嘉遁距尘寰，何幸乘闲一蹑攀；
云影天光池水碧，竹溪松径藓痕斑。
敲诗剩得趣中趣，纵目望穿山外山；
试问幽栖是何处，阿衡莘野吕公簷。

此诗颈联两句蕴含赞许王训有诗才和有远大目光的意思。末句把王训比作伊尹和姜尚，对王训推崇备至。另外一位诗人江藻也曾赠诗王训云：

满抱经纶隐此山，就中佳致足盘桓；
箋箋束帛终当聘，未许幽栖老谢安。

把王训比做有治世之才、由隐居而东山再起的谢安。这些都可见王训在当时的影响。还应该指出，王训在贵州做过不少有益于文化发展的工作。他曾为修学校出力，《图经》曾说：“……训导昌黎王训各以貲力来助……”。他又与当时的按察副使李睿建讲堂，还与李睿一起为文庙制铜爵一百八十个。同时他为不少风景名胜地或有关文化的地方，如东庵、嘉瓜亭、忠烈庙、无边风月楼、朝阳洞等作记或题诗。这些都是为发展贵州文教所作的贡献。《图经》说：“成化以兴，足以绵

纂后来，簪龟多士。先是郡学制度草创，训与副使李睿极力营建，与中州等。”莫友芝也谓：“黔人著述见于史者，别集始于教授（按：指王训），经说始于天爵（按：指易贵），允推明代文教之鼻祖，其开创之功，不在道真（尹珍字）、长通（盛览字）下”。这种说法，确非虚语。

现存王训的十首诗中，有四首是题咏贵阳风物的，一首是赠友人归隐的，五首是逆旅抒怀的。自然，这十首诗作或为王训诗的一小部分，未必即其精要，但诗人的艺术造诣及其诗的风格、意境，亦可略见一斑。

题咏贵阳风物的四首诗：《朝阳洞》、《真趣亭》、《无边风月楼》和《南庵》，诗人以劲健的笔触，写出了贵阳这四个名胜的优美景色。朝阳洞“在治城东北六十里，废谷麓长官司侧，其中可容数百人，悬崖滴乳，千态万状，极其巧怪，间有青绿傅于崖石，殊为奇绝，游观者多品题焉。”（《图经·山川》卷一）可见这一游赏胜处，当时游人之众。贵州是岩溶地形发育得很好的地区之一，溶洞的深邃和景色的幽美，在全国亦不多见。诗的首联两句：“朝阳仙洞若蓬莱，万朵芙蓉顶上开。”一起就很突兀陡峭，描绘出朝阳洞的概貌。第一句以蓬莱仙境作比，第二句即点出洞内的景色，这是比兴同用：钟乳石在洞顶如艳开的千万朵芙蓉花。诗人抓住了朝阳洞的特点，以奇特的想象，使人如睹万花竞发的情景，如闻鲜花的馨香。颔联两句：“里面山窗通日月，外头云路隔尘埃。”是用从洞内又回到洞外的夸张手法，描绘出山洞位置的高峻，竟能与日月相通。洞外白云缭绕，环境幽静，真是“多少游人看不尽”的“仙洞”啊！《真趣亭》一诗的颈尾两联四句：“花雨有声喧贝叶，条风无力扫苍苔；禅心净似方池

水，夜月光中绝点埃。”是大有道心玄悟的表现，对于亭的周围景物和清幽气氛，烘染得十分逼真。花雨缤纷，仿佛簌簌有声，似诵贝叶真经，是“通感”的手法；清风徐徐，吹动嫩柔的枝条，轻抚着碧苔，是动中显静的景象。在皎洁的月华里，池水清澈如镜，无论形象，无论色彩都鲜明如画。真趣亭在当时贵阳永祥寺的后园；另一景胜无边风月楼在贵阳城北八里，文士宋昕修建（均见《图经》）。《无边风月楼》一首，颔联两句云：“入帘剪剪春三月，到枕娟娟夜半天。”极具晚唐风韵，真是水流云在，月到风来，不仅工整而且极有情致。《南庵》一首，中间两联将南庵的位置特点写出，把清幽的环境呈现无余：“山腰倒接城边路，水口斜通阁外桥。深院落花无客扫，空门掩日有谁敲？”“倒接”、“斜通”用得极妙，渲染几笔，境地自呈。南庵在贵阳城南，《图经》云：“在治城南门外霁虹桥之东，旧名南庵（按：后改名圣寿寺）。前俯清潭，后负崇冈，群峰列岫，左右环绕，草木竹石，杂置错陈。论者谓郡中诸寺，据高阜之胜者，莫如永祥（寺），而得山水之胜者，莫如此焉。”刘子元《武侯祠记》云：“南庵故有祠祀侯，前挹郡城，下瞰渔矶，烟水飘渺。余姚王文成公守仁（即王阳明），有南庵次韵二首律诗，今《省志》题作《武侯祠》，知祠址旧在庵中也。霁虹桥在城南跨南明河……”诗人王训笔下，这里确是“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的萧疏意境。

《送陈昌归隐东山》一诗，是赠友人陈昌的。陈昌，贵阳人，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举人，官知县。东山距城二里，甚幽峭。此诗颔联云：“公卿不入新来梦，父老犹思旧任官。”褒扬陈昌为官清正，不慕荣华。颈联两句则写陈昌归隐

后的安闲自得：“鞭犊试耕云半亩，闻鸡常卧日三竿。”最后两句：“不应海内思霖雨，却使苍生望谢安。”是用谢安作比，称赞陈昌颇有政声，同时还含有不尽同意陈昌归隐之意。也隐约透出他对民间疾苦的一点关心，对“公卿”的一些不满。这虽然比较隐晦，但也有迹可寻。

《程番客夜》五首，是旅程番途中之作。程番府在今惠水县，明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七月分贵州宣慰司地置；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六月移入布政司城，与宣慰司同治。这几首诗苍凉激切，雄郁顿挫，不平之气发于肺腑，是诗人中年以后所作。诗人自少即有大志，十八岁就上策论列国家大事，可见是很有一番远大抱负的，也是很有才干的。诗人想到青年时期，应举入幕，佐赞军事，运筹帷幄之中，但仕途多舛，自己的才能和抱负不得施展，以致中年潦倒。“暴客尚存愁逆旅，奸谀不死恨英雄。”诗人指出边廷虚功无实，奸谀弄权，只有使英雄气短而已。王训中举后，只当过训导、教授之类的小官，中间曾两度参赞军事，出谋划策，也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后来便隐居白崖山，此种境遇使素有大志的王训万分感慨。他深恨仕途坎坷：“亡羊路险豺当道，倦鹤巢寒雪满林。”既看到当道的达官贵人多是凶恶豺狼，又感到自己巢寒林芜的境况，真是愤懑万端。“重来顿觉蛮山险，老去方知世路偏”，不无世途艰险之感。“曾于丹徼提三尺，羞向青铜见二毛。”诗人回忆持剑从戎，何等抱负！而现在对着明镜，见到两鬓已斑，怎能没有英雄迟暮，一事无成之悲呢？诗人更感知音难索，因此发出“和得阳春徒自尔，更阑无处觅知音”的感喟。诗人怀才不遇，潦倒中年，但其豪气犹存。《客夜》第四首的颔联两句：“老树尽堪成大用，好

山不得在中原”，抱负十分明显。自己虽然老了，但是还可以大有用处，决不是一个庸才。而他人或以为天末无才，哪知天末人士正如雄峙的好山，这种好山生在边徼，在中原地区是不会有的。这是何等自负，何等襟抱，何等气魄！真是老骥伏枥，仍怀驰骋之心，更有用世之志。贵州当时地处边陲，僻远荒凉，是为贬谪充军地，中土人士多不关注，且视为畏途。而王训此诗自有一种力争上游，藐视中原的气概，读之能令人奋袂兴起。莫友芝谓旧记称其诗文雄伟。的确，由此五首律诗看来，实非不虞之誉。其意气豪放，使人一唱三叹。王训诗雄郁苍凉的风格，由此可以略见一斑，也可见诗人高深的艺术造诣。清代学者和诗论家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里曾称许明代贵州诗人宋昂、宋昱兄弟，说二人“皆能诗……埙篪叠奏，风韵翩翩，试掩姓名诵之，‘以雅以南’，莫辨其出于‘任昧侏离’也”。目二宋之诗，是莫辨其出于“蛮夷”之地的诗歌。惜朱氏未见王训之诗，否则，我想他一定更会倾倒逾于二宋。就二宋诗与王诗作比较，王诗的雄浑之气，当在二宋之上。就现存的王诗论，与当时东南名家相较短长，亦可建旗鼓与相匹敌。

顺便提及王训的两篇记，一篇是《东坡月潭寺记》，这篇游记描绘了月潭寺的景色风貌，层次清楚，造句生动，气格紧健，与其诗境一脉相通。另一篇是《建东庵记》，文虽主要是记叙位于东山上的东庵的修建始末，但王训以饱含诗情画意的笔触，描绘出了这个诸山盘旋，丛林蓊郁，曲折清幽的风景区，确是贵阳难得的一个境界佳胜地。王训还有《嘉瓜颂》一篇，借嘉瓜来对皇帝“盛德”歌咏赞美，是应批判的溢美之章，此亦可见其思想的和时代的局限方面。

王训生平事迹之不详，所作诗文又散佚殆尽，确是令人十分遗憾的事。现所搜寻到的十首诗，确实不过一鳞半爪而已。由此亦使人深感妥善保存管理文物的重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王训作为明代黔地早期有成就的诗人，是当之无愧的。而且可以说，他对当时贵州的教育与文化，都起过较大的推动作用。

读邱禾实的山水诗文

张 亚 新

鲁迅曾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不无感慨地说：“中国文学史，研究起来，可真不容易。研究古的，恨材料太少，研究今的，材料又太多，所以到现在，中国较完全的文学史尚未出现。”用这段话来说明贵州古代文学的研究状况，也是非常切合的。贵州由于开发、建制较晚，明以前几乎没有文学作品流传下来。明以后，文化教育开始发展，文人著述渐趋丰富。但由于统治者的忽视，也由于贵州地处偏僻，交通阻塞，文化、出版事业依然落后，因此一些文人著述未能刊行，部分虽然刊行，但流布不广，保存不善，后来散佚的不在少数。有关作家生平环境、创作道路、文学思想一类记载，就更加难于见到。这样，关于贵州古代作家的材料就实在恨少，研究起来，殊非易事。

明代作家邱禾实便是这些“材料太少”的作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邱禾实的文学创作本来较有成就，在明代可与孙应鳌、谢三秀、吴中蕃、杨龙友等大家媲美。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引《康熙通志》说他“才高学赡”，引《贵阳府志》说他“文章详雅，贵州有大政须记载者多出其手，郭子章修《黔记》及贵定建县、新添改马政禾实皆为之序记”。可是，邱禾实所著《循陔园文集》八卷、诗集四卷（均载《明史·艺文志》）以及《经筵进讲录》等著作都已遗佚，使我们

今天已不可能对他的整个创作面貌和文学成就作出评价。尚可庆幸的是，《黔诗纪略》卷十一还载有他两篇文和十四首诗。这些诗文大部分以贵州山水为题材，流露了作者热爱家乡风物的深厚感情。贵州虽然地处偏僻，而奇山秀水随处可见，很早就成了骚人墨客的吟咏对象。但有明一代，由于制度所限，贵州文人凡为官作宦均在外地，因此在他们流传下来的作品中涉及贵州山川风物的并不多，邱禾实的这部分作品值得重视。为了增进我们对于贵州山水的热爱之情，也为了对邱禾实的创作面貌和文学成就获得一个粗略的认识，对这部分山水诗文作一些探讨，想来不是没有意义的。

这些作品中，散文《游凭虚洞记》篇幅较长，艺术上也较有特色。凭虚洞原名母猪洞，在贵定城西十五里。《游凭虚洞记》较为详尽地记述了作者游览该洞的始末经过。作品开头，在对凭虚洞的发现作了简单交待后，作者从站在洞外观赏的角度对洞的大势作了直接、概括的描绘：

洞高数十仞，玲珑层复，宛然楼居。洞左有水自半山东下，势如建瓴，前与洞水合流为涧。觅水所自来不可得，盖此山为藤萝所封几千年矣。

寥寥数十字，把洞的高度、形状、洞左悬瀑的流势、去向以及整座山自古被藤萝所封的情状作了明白交待和生动描绘。“洞高数十仞”，洞之雄奇森罗自可想见。“玲珑层复，宛然楼居”，可见洞中有洞，洞上有洞，布局决不单调平板，使人一览无余。“势如建瓴”的飞瀑自半山东下，给清寂的山洞增添了无限生气和活力；而此山自古被藤萝所封，又给山洞增添了浓郁的神秘萧森气氛。作者“既诧其胜”，于是命僮仆芟夷丛莽，施之行火，火烬而得洞门。洞门“曲卷逶迤，宛若

天构，顾陡峻不可级”，于是作者又命僮仆两人一前一后攀藤附葛，自己则“以手若足属僮登焉”。经过一番努力，终于进入山洞，看到了洞内景象：

洞广数丈，深倍之，前俯临洞，尚有藤萝封之，苍翠交映。其后为沉泉，深数尺，清可以鉴。泉后岩最穹窿，稍左有门，方丈，厥中黯如，余不能渡，泉亦不敢就视。

洞的宽度、深度及洞内前后景物情状，叙述详尽，方位清楚，层次明朗，形象真切，使人读后，历历如在目前，显示了作者的艺术描写能力。

前面说过，凭虚洞是“玲珑层复”、洞中有洞、洞上有洞的。刚才描写的这个洞位居下层，从这个洞“循岩而西，有滴处可级，可达上洞”。但悬岩绝壁，岌岌可危，“稍失足则堕泉中”。作者“畏甚，然不能舍”，于是又用老办法，让僮仆扶着拉着，“再登焉”。“登处有罅，下通者二，余不敢旁睨。第以目属僮，以足扪级，凡再喘息，得达”。作者小心翼翼之状可掬，既不敢旁睨，也不敢出声，对僮仆唯以目示意而已。通过对攀登时紧张形态的描绘，透露出极度紧张的精神状态，而由此也有力地反衬出山势的陡峭险峻。这种紧张情绪也传染给了读者，使读者获得了身临其境的实感。不过，只有勇于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理想的高度。作者在付出辛劳到达上洞后，果然得到了异乎寻常的收获和感受：

余坐洞门纵观之，则悬岩缤纷，如伏龙，如蹲虎，如委佩，如流苏，不可状。乃前一罅直贯山顶，罅上一石直立如人形，岩浆滴其首端，盖千百年来浆所结也。

洞上睨下，洞如百尺楼，涧洞水又似在重檐下。风山前

峙，若相拱揖，而北风袭人，令人有凭虚御风之想，余因名洞曰凭虚，以更其陋。

这里叙述的是整个游览的高潮，读后真有无限风光在险峰之感。作者坐于洞门，各种奇异景色风涌云会，令人目不暇接。纵观则悬岩缤纷，变态百端，不可名状。“如伏龙，如蹲虎，如委佩，如流苏”四句，刻画形象，贴切生动。伏龙、蹲虎喻其大者，委佩、流苏肖其小者，大小杂陈，姿态各异，相映成趣。仰视则直透山顶，见罅上一石直立如人形，系千百年来岩浆所结，大自然之神奇与伟力，令人惊异。作者于此虽只平平叙出，但对读者心灵深处仍有不小的激荡与启迪。再从洞上下睨，见洞如百尺楼，涧水则又似在重檐之下，与前面“宛然楼居”的感觉后先照应。接着，作者写凤山前峙，北风袭人，悠然惝恍中仿佛进入了宋代苏轼在《前赤壁赋》中所写的“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境界，一时兴之所至，于是将母猪洞的旧名更改为凭虚洞。作者凭虚御风的奇特感受，进一步反衬了山川景色的神奇灵秀。

接下去还有一段引人入胜的文字：

方余登洞时，余弟嘉捷甚，凡先余上下者再，不恃僮，又数代僮掖余。余既下，则鼓余渡水视石门，余辞不能，则裹裳独往。久之出谓余曰：“门内方丈余，更有重门其中，若明若暗，若泉若渊。且重门上累累若有所属，殆龙蛇之属乎？”弟又前视泉中一物，长尺有咫，鳞甲皆具，余恐其真龙也，挽俱出。然弟犹惜不以火竟云。

前面一路写来，这里突然倒叙一段，波澜回环，为文章

生色不少。这段文字把读者带进了一个更加幽邃奇异的境界。前面描写下洞“泉后岩最穹窿，稍左有门，方丈，厥中黯如”，但因作者“不能渡，泉亦不敢就视”，个中景象到底如何，不得而知。这段倒叙，为读者解除了悬念。原来石门之内别有洞天，沉泉之中另有异物。“重门上累累若有所属，殆龙蛇之属”的狐疑，“泉中一物，长尺有咫，鳞甲皆具，余恐其真龙”的惊惧，也给读者带来了一种心悸魄动的感觉。作者在这里不仅写了景和物，也还写了人。到这里我们才知道，与作者同游的除了僮仆外，还有其弟邱禾嘉。邱禾嘉字献之，举万历四十年（1612）乡试，好谈兵，崇祯元年（1628）授兵部职。其时山海关一带战事纭扰，清兵屡屡犯边。邱禾嘉力主抗敌，亲赴前线，指挥进退，功绩卓著。崇祯三年（1630）被拜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宁远一线，兼辖山海关诸处。此后，仍然屡有建树，但因与当朝官僚持论不合，遭疑忌诋诃，于是坚以疾请，诏命归田，未离京而卒。与其兄同游凭虚洞，一定是早年的事。在游览中，他身手矫健，英姿勃勃，时时活跃在作者前面，不依靠僮仆帮助，还数次代替僮仆帮助作者。到了下洞，他鼓动作者渡过沉泉探石门，作者辞以不能，他则毫不犹疑，褰裳独往，“门内方丈”等情况，都是他亲眼目睹、转告作者的。最后，作者因心怀疑惧，挽其出洞，他仍以不能火竟为惋惜。种种表现，已显露出邱禾嘉不避艰危、沉毅果敢的精神品格，这种精神品格通过与作者本人的鲜明对比而显得越加突出。这篇游记实在也是一篇刻画了人物形象和性格的作品。

接下去，作者写他们一行出洞“相与就壶觞”，小憩之后，豪兴未减，“因复从左山索之，复得一洞”，洞中巉岩之